

红四军大柏地借粮



图为毛泽东、朱德在大柏地王家祠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旧址。 鲁国振 摄

1929年2月9日,从井冈山下来的红四军来到瑞金大柏地宿营。此时,红四军被驻国民党军第十五旅刘士毅部追得精疲力尽。当天,正是农历除夕。清晨,军部命令部队往宁都方向开拔。被敌人追得疲惫不堪的前卫三十一团三营“抗命”不前,派出代表联络其他连队,发誓要和追敌刘士毅决一死战。营党代表罗荣桓和营长陈明代表全营前往军部请战。

鉴于大柏地两边是高山,中

间是一条长达5公里的羊肠小道,是一个打伏击的极好战场。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决定顺应军心,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狠狠打击尾随之敌,以振军威。

大柏地村中的老百姓对红军不了解,已经逃避一空。虽然部队已经一天未吃饭,又饥又寒,但红军有红军的纪律,主人不在,不能随便动用老百姓的东西。

要打好此战,必须让战士们吃

饱饭,养足精神,但红军已经没有经费了!管经费的同志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听了,觉得确实是个问题。就说:“总不能叫大家饿着肚子打刘士毅吧。军长,你说呢?”朱德点头:“是呀,要打仗,不吃饱饭怎么行?”

前委秘书长江华趁机建议:“能不能这样,让部队先借用村中老百姓的食物,但一定要算清价钱,留下欠条,待以后如数归还。”毛泽东听后,思索片刻回答:“你去

通知部队吧,只好如此了。”非常时刻,毛泽东网开一面,同意向群众借粮救急。

红军各连队得到批准后,就借用当地群众的粮油,饱餐了一顿,养足了精神,在大柏地战斗中一举歼敌两个团,俘敌800人,缴枪800支,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重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红军离开大柏地,向宁都县城进发。

红军走后,老百姓从山上回到家中,发现家中准备过年的食物都给吃光了,顿时怒火中烧,骂声不断。可是家家户户掀开锅盖、米缸盖一看,只见都留着一张纸条,上面说明红军不得已吃了什么食物,价值多少,但因红军经费紧缺,一时付不了钱,以后一定如数归还,嘱咐房主人要妥善保管好纸条,当作以后还钱凭据。

人们难以置信:世上哪里还有这样的军队呀?可留下的纸条又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只好将信将疑。

50多天后,红四军由宁都县城向闽西进军,重返大柏地。毛泽东没有忘记红军对老百姓许下的诺言。他亲自召集大柏地群众开大会,向大家说明当时红军被迫向老百姓借粮借菜的情况,表示衷心的感谢。部队当场向老百姓兑现所欠的款项。有的老表原来不相信红军的承诺,把欠条撕毁或丢弃了,只要说个数目,红军照数给款,分文不少。这一次,红军共发出3500块大洋。红军维护群众利益的举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

大柏地全村立刻欢腾起来,群众说:“红军说话算数,丁是丁,卯是卯,我们信得过。”

苏区的“铁包公”——陈云铁面整顿兵工厂

陈云历来办事严谨认真,雷厉风行。当天晚上,陈云顾不上休息,就到工人中了解情况。

寨上兵工厂的厂长叫李志云,湖南人,旧军人出身,脾气暴躁,作风粗俗。陈云在调查中发现工人们都对李厂长有意见。工人们普遍反映,李厂长严重渎职,天天晚上打牌,作风不民主,缺乏对工人的培训和教育,也缺乏严格的管理制

度,处理问题主观、武断,甚至打人、骂人。有几名工人做错了一点小事,竟被他罚跪了几个钟头。工人们说,这个李厂长,简直就是个资本家!

工人们反映的意见,引起了陈云的高度重视。为了核实情况,他又与厂职工会的代表们座谈,听取职工会的意见。核实结果与工人们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

陈云严肃起来。他认为,在我们的苏维埃区域,工农兵都翻身作了主人,工人更是苏维埃国家工厂的主人。李厂长这种随意打人、骂人的作风,与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必须严肃处理。

陈云果断地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在会上讲话时,他将了解到的情况全部端了出来,对李厂长的恶劣作风给予严厉批评。他旗帜鲜明地当场宣布:“这样的厂长必须撤职查办。”事后,工人们纷纷议论说:“上级派来了一位‘铁包公’。”工人们和陈云秉公办事、光明磊落的作风赞不绝口,生产积极性一下爆发出来了。

徐特立管“闲”事



徐特立

→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徐特立在中央苏区瑞金时的办公室兼住房。 杨友明 摄

苏区时期,童养媳的风俗曾一度普遍存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建立以后,苏区的苦孩子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化学习。有的公公婆婆怕失掉自己的儿媳妇,就把他们锁在屋里不让出来,以“不规矩”为由把她们毒打一顿。看到这种情况,徐特立心里很难过,他认为:“争取妇女的解放,首先应争取童养媳的解放。”

经过一番调查,他发现童养媳的人家一般都比较穷,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是党的基本群众。因此,徐特立做这个工作要特别的耐心和细致。

有一次,徐特立在黄柏小坑村



做调查发动工作。一个只有十五六岁的瘦弱姑娘,慌慌张张地跑到他跟前,泪流满面,苦苦地哀求说:“徐伯伯,你要救救我呀,你不救我,我只有死了!”

原来,她是本村一家人的童养媳。这些日子,她一直与她婆婆吵着要求读夜校,婆婆不允,硬是逼她与比自己大20多岁的男人成亲,当天就是结婚的日子。她急坏了,突然听到徐伯伯来到村子里,就偷偷地跑了出来。她恳求说:“我宁死也不结这门亲!求求你同我公公婆婆说说,退了吧!”徐特立一问,知道这家人对党的各项工作都是积

极拥护的,只是在儿女婚姻问题上仍然存在封建思想。

他当即来到这户人家,一看,果然在准备办喜事,门上贴着双喜的红字,屋里摆着酒席,贺客也已经到了。他耐心地对老人说:“共产党主张婚姻自由,你家的童养媳不愿同你儿子成亲,找我这个老头子来了。我们党的政策,只要有一方不愿意,就不能勉强,这门亲事你们再考虑考虑。他们两个感情不好,勉强结了婚,也不会有幸福。再说,你家童养媳积极要求去读夜校,这是应该支持的,我们穷人苦就苦在没有文化上,让人愚弄欺负,有了文化就能参加工

作,为革命作贡献。我今天来,就是同你们商量,先不要办这门亲事,让她趁年轻去参加文化学习。”

两位老人对徐特立的话感到很意外,同时也顾虑很多。徐特立反复给两位老人讲政策、讲道理,打比喻,两位老人终于被徐特立的一片苦心所感动,便取消了这桩婚事。徐特立高高兴兴地带着这个童养媳到村夜校报了名。

事后,徐特立为列宁小学国语课本编写了一篇课文,取名为《三字经》,它的开头几句是:“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

“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这是苏区军民提出的一句响亮口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成为苏区军民的自觉行动。比如点灯,规定每盏灯只能用一根灯芯,如果用两根灯芯,马上就有人提出批评。毛泽东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按照规定夜晚办公可点三根灯芯,可他仍像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一样,坚持只点一根灯芯,经常在昏暗的灯光下工作到天亮。

1934年3月13日,《红色中华》编辑部向全体苏区军民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陈云、博古、邓颖超等23位从白区进入中央苏区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率先响应,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报,表示:“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中央政府各部在“节约总会”推动之下,召开大会并一致通过六项节省规定:“一、从即日起每日每人节省一个铜板,特别是劳动部的工作人员主动提出将每天一角钱的伙食费减为九分钱,并且还要每日每人节约一个铜板;中央国民经济部则提出每人每日节省大洋一分。二、不上馆子,不吃小食。三、节省办公费百分之三十,纸张笔墨灯子灯油有一定的规定,晚上不办公时三人共用一盏油灯看书报;起草文稿利用油印废纸,不需写小时都用差等毛笔。四、普遍建立节省箱。五、各乡建立一个菜园,自己种植蔬菜。六、坚决开展‘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整个苏区迅速掀起群众性节约高潮,“勤俭节约光荣、奢侈浪费可耻”成为苏区的新风尚。



一根灯芯见证勤俭节约。

自带干粮去办公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生活极其困难。为节约经费,共克时艰,支持红军的反“围剿”战争,1934年春,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长胡海等高级领导干部,带头不要公家发伙食费,自己从家中背米到机关来办公。

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那些家在苏区的苏维埃机关干部纷纷效仿。据1934年3月13日出版的第161期《红色中华》登载,先后有王金龙、张义贤、李日赓、朱福连、朱良仁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从家里自带米菜来办公。苏区干部自带干粮来办公的新风尚,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称赞,这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作风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央有人带了头,省、县、乡干部也不甘落后。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带头叫妻子从兴国老家步行百里,送米到设在宁都的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来,给他做口粮。他妻子开初很不理解,半开玩笑半埋怨道:“老公老公,饭要我供。你当个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怎么连饭都赚不到来吃呀?”

刘启耀听了,笑笑说:“现在革命遇到暂时困难,等日后革命成功,吃穿不穷。”他耐心地向妻子说明了原委,并说自己是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应该带头替政府着想,帮助政府克服困难。

他妻子听了,怨气顿消,笑着表示:“行,以后我每个月都从家里挑一担米到宁都来给你吃!”

在胡海、刘启耀等带动下,家住苏区的本地干部,纷纷回家背米背菜吃,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后来,苏区群众自编了一首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正是当年苏区干部好作风的形象概括和真实写照。



兴国苏区干部好作风纪念馆内的“自带干粮去办公”展览模拟场景。(资料图片)

节约每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